

# 从边缘到中心：叙利亚阿拉维派的历史嬗变与现实挑战\*

杨玉龙\*\*

**内容提要** 叙利亚阿拉维派具有信仰融合性、部落性、“塔基亚原则”、集中聚居特征。19世纪福音派传教运动的西式教育使阿拉维派产生了融入主流伊斯兰世界的意识，开启了阿拉维派与叙利亚社会的融合进程。法国委任统治制度给予了阿拉维派内部自治权利，实现了阿拉维派的社会平等化；叙利亚共和国建立后议会民主制的脆弱性和军人干政导致叙利亚政治发展陷于摇摆和混乱，为阿拉维派军官群体的政治发展创造了上升渠道和历史机遇，阿拉维派军官群体通过国防军和复兴党上升至国家权力中心。阿萨德体制建立后社会内生性的复杂矛盾外化为穆斯林兄弟会社会运动，形成对阿萨德威权体制的严峻挑战。2011年叙利亚危机对阿拉维派造成了全方位冲击，群体安全受到威胁、内部政治分裂、教派关系出现裂痕。近年来叙利亚战场形势已发生根本扭转，危机对阿拉维派的挑战大为缓解，阿拉维派在未来国家重建时期将面临阿拉维派难民、去教派化和族际关系重建、重构内部团结等难题。

**关键词** 阿拉维派 叙利亚 复兴党 穆斯林兄弟会 叙利亚危机

阿拉维派（Alawites）是叙利亚国内仅次于逊尼派的第二大伊斯兰教教派，历史上的阿拉维派又被称为“努赛里派”（Nusayris），其教派起源可追

---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叙利亚古代史研究”（2018VJX086）、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古叙利亚文明史研究”（19JZD043）、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科研启动费项目（Z109022059）的阶段性成果。

\*\* 杨玉龙，博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副研究员，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特约助理研究员。

溯至一千年前拜占庭帝国统治叙利亚时期。公元10世纪至19世纪早期，阿拉维派处于叙利亚社会的边缘。近代以来，阿拉维派逐渐打破了自我封闭的状态，与现代叙利亚政治发展进程形成了密切联系。1946年叙利亚共和国建立后，议会民主制受到军人干政频繁破坏，逊尼派政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为阿拉维派军人集团创造了掌握政治最高权力的历史机遇。阿拉维派军人集团在政治、军事领域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叙利亚政治发展进程，阿萨德总统创建的新威权主义体制实现了叙利亚政治长期稳定，结束了二十年的政治不稳定形势。

在现代叙利亚历史发展进程中，阿拉维派精英阶层和军人集团发挥着关键性政治作用。因此，研究阿拉维派在叙利亚的社会地位的变迁及政治角色的转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一方面，国内目前对叙利亚阿拉维派相关问题的研究相当薄弱。<sup>①</sup>而西方学术界近年来对阿拉维派的宗教信仰、历史、认同、政治、教派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已积累了一些相当有深度的成果。<sup>②</sup>研究阿拉维派社会地位的历史变迁、教派信仰的特征、教义，阿拉维派与叙利亚政治发展的关系，具有丰富的学术内含；另一方面，阿拉维派与叙利亚复兴党政府的内在联系对理解和反思叙利亚危机的起源、演变和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 一 叙利亚阿拉维派的边缘化和文化启蒙的肇始

叙利亚共和国建立后，在1956年进行过一次宗教信仰人口普查，当时叙

- 
- ① 目前国内以叙利亚阿拉维派为研究对象的专业性论文主要研究叙利亚阿拉维派的认同问题，叙利亚教派关系问题，阿拉维派与叙利亚政治、社会的关系，等等。参见王霏《法特瓦与阿拉维派被承认的历史》，《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6期，第107~111页；王霏、张丹《阿萨德统治时期叙利亚阿拉维派的认同困境》，《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1期，第20~26页；张超《巴沙尔时期叙利亚什叶派的增长及对教派关系的影响》，《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1期，第27~32页；龙昭《论叙利亚政治与社会中的阿拉维派》，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3。
- ② Meir M. Bar-Asher, Aryeh Kofksy, *The Nusayri-Alawi Religion: An Enquiry Into Its Theology and Liturgy*, Leiden: Brill, 2002; Michael Kerr and Craig Larkin eds., *The Alawis of Syria: War, Faith and Politics in the Levant*,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5; Leon Goldsmith, *Cycle of Fear: Syria's Alawites in War and Peace*, London: Hurst Publishers, 2015; Stefan Winter, *A History of the 'Alawis: From Medieval Aleppo to the Turkish Republi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利亚 75% 的人口为逊尼派, 11% 的人口为阿拉维派, 基督教各支派占 10%, 其余是人口较少的德鲁兹派、伊斯玛仪派等。<sup>①</sup> 阿拉维派属于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分支, 以伊玛目信仰为核心教义; 阿拉维派主要分布于叙利亚地中海沿海区域。20 世纪 80 年代末阿拉维派人口增至 130 万人, 其中 75% 居住在拉塔基亚地区,<sup>②</sup> 至 21 世纪初, 阿拉维派人口达到 200 万人, 其中 20 多万阿拉维派人口聚居于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等大城市,<sup>③</sup> 此外有数十万阿拉维派<sup>④</sup> 人口居住在土耳其伊斯坎德伦地区。

### (一) 叙利亚阿拉维派的宗教社会特征

叙利亚阿拉维派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 阿拉维派信仰的融合性特征。其一, 阿拉维派的世界观是循环论理念, 他们认为世界有七次循环和灵魂转生 (Transmigration of Soul)。其二, 阿拉维派认为生死与天空星辰有联系, 今生有德之人将死后成为天上星辰。<sup>⑤</sup> 其三, 阿拉维派庆祝圣诞节、圣灵降临节等基督教文化影响下的节日。<sup>⑥</sup>

第二, 阿拉维派内部社会结构的部落性。阿拉维派分属不同的部落单位, 教派内部缺乏权力中心, 松散的部落联盟由卡尔比亚 (Kalbiyya)、哈达丁 (Haddadin)、卡亚丁 (Khayyatīn) 和马塔维拉或称努米拉提亚 (Matawira or Numilatiyya) 组成, 四大部落关系松散, 没有居于统治地位的部落势力。

第三, 社会边缘化时代的阿拉维派使用“塔基亚原则”保护其信仰。

① Torstein Schiøtz Worren, *Fear and Resist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Alawi Identity in Syria*, Master Thesis in Human Geography Dept. of Sociology and Human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Oslo, 2007, p. 39.

② Danial Pipes, “The Alawi Capture of Power in Syria,”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25, No. 4, 1989, p. 429.

③ Eyal Zisser, “The Alawis, Lords of Syria: From Ethnic Minority to Ruling Sect,” in Ofra Bengio and Gabriel Ben-Dor eds., *Minorities and the State in the Arab World*,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1999, p. 92.

④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土耳其阿拉维派与叙利亚阿拉维派是两种类型不同的什叶派信仰支派, 两派在起源、发展、信仰形式、教义、教法、传统习俗与礼仪等方面均有很大差异。而伊斯坎德伦阿拉维派历史上属于叙利亚阿拉维派的一支, 20 世纪 30 年代法国委任统治政府将该地区割让给土耳其共和国, 使该地区的阿拉维派成为土耳其公民。

⑤ Aslam Farouk-Alli, “The Genesis of Syria’s Alawi Community,” in Michael Kerr and Craig Larkin eds., *The Alawis of Syria: War, Faith and Politics in the Levant*, p. 29.

⑥ Valentina-Tania Duna, “Religious Minorities, Political Majorities: The Alawis in Syria and the Maronites in Lebanon,” *Romani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Vol. VI, No. 2, 2012, p. 104.

历史上阿拉维派对自身信仰保持较为神秘的状态，主要是由于长期受到逊尼派统治者和外来侵略者的宗教压迫或污名化。

第四，阿拉维派集中聚居的特征强化了教派认同意识和内部团结性。相较于叙利亚国内其他少数民族或教派的分散性分布特征，阿拉维派集中分布于地中海东岸和贾巴勒·努赛里亚山脉（Jabal Nusayriyyah）之间的狭长地带，集中聚居有助于增强阿拉维派的宗教认同意识，<sup>①</sup> 相对地隔绝于逊尼派、东仪天主教等叙利亚其他宗教或教派，促进了阿拉维派内部文化同质化。

## （二）叙利亚阿拉维派的起源与历史演进

叙利亚阿拉维派由伊本·努赛尔（ibn Nusayr）创建。伊本·努赛尔是什叶派第十一代伊玛目哈桑·阿斯卡里（Hasan al-Askari）的学生。1032年，阿拉维派学者阿布·赛义德·麦蒙·塔巴拉尼（Abu Sa‘id al-Maymun-Tabarani）前往当时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拉塔基亚地区定居传教，塔巴拉尼通过传教和著书立说对拉塔基亚农村地区居民的宗教信仰产生了深远影响，<sup>②</sup> 自此拉塔基亚地区成为阿拉维信仰的核心区域，塔巴拉尼的宗教思想成为阿拉维派信仰的基础。<sup>③</sup>

阿拉维派形成后，历史上曾屡遭外来统治者的歧视和压迫。14~16世纪叙利亚地区被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统治，马穆鲁克苏丹拜伯尔斯（Baibars）曾强迫阿拉维派建立逊尼派清真寺，试图将阿拉维派归化为逊尼派信仰。马穆鲁克王朝对阿拉维派的政策曾引发阿拉维起义，1317年，阿拉维派的穆罕默德·伊本·哈桑（Muhammad ibn al-Hasan）宣布自己是马赫迪降世，<sup>④</sup> 反抗马穆鲁克王朝的外来统治和同化政策，阿拉维起义旋即被马穆鲁克军队镇压，约2万起义者被杀。<sup>⑤</sup> 阿拉维起义失败后，逊尼派宗教学者伊

① Heather M. Robinson, Ben Connable, David E. Thaler, Ali G. Scotten, *Sectarianism in the Middle East: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8, p. 74.

② Halm Heinz, *Shi'is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57.

③ Aslam Farouk-Alli, "The Genesis of Syria's Alawi Community," in Michael Kerr and Craig Larkin eds., *The Alawis of Syria: War, Faith and Politics in the Levant*, p. 31.

④ Aslam Farouk-Alli, "Sectarianism in Alawi Syria: Exploring the Paradoxes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Vol. 34, No. 3, 2014, p. 211.

⑤ Danial Pipes, The Alawi Capture of Power in Syria,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25, No. 4, 1989, p. 435.

本·泰米叶 (Ibn Taymiyyah) 发布法特瓦, 宣布阿拉维派是“伪信者”的“异端信仰”,<sup>①</sup> 伊本·泰米叶发布的法特瓦从教法方面将阿拉维派定义为所谓的“异端”, 并在法特瓦中提出了大量禁止接触阿拉维派和推行宗教同化政策的具体措施, 从而加剧了阿拉维派的社会边缘化, 更加远离了伊斯兰世界主流社会。<sup>②</sup>

1832 年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占领叙利亚, 政权更迭第一次松动了阿拉维派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社会边缘地位。负责统治叙利亚的易卜拉欣帕夏充分利用了宗教少数派为其控制叙利亚而服务, 易卜拉欣帕夏推行西化和世俗化改革, 废除了中古时期对阿拉维派的“异端”法特瓦, 给予阿拉维派平等的社会地位, 要求逊尼派和阿拉维派缴纳同等比例税赋。<sup>③</sup> 不过, 埃及对叙利亚的统治极为短暂, 1840 年后奥斯曼帝国恢复了对叙利亚地区的统治地位, 阿拉维派再次沦为边缘化的“异端”少数派。

19 世纪奥斯曼帝国日益衰落的趋势引发欧美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等多方面的渗透和控制, 基督教传教运动逐步深入奥斯曼帝国统治腹地。西方国家对奥斯曼帝国的基督教传教运动包含有多重目的, 而传教运动方式对中东地区及阿拉维教派产生了深远影响。18 世纪后期, 俄罗斯等国先后通过条约形式取得对奥斯曼帝国内基督教群体的保护权利, 名义上是保护基督徒群体和圣地, 其政治动机是借由宗教保护之名获得政治和经济利益, 干涉奥斯曼帝国内政, 加强对帝国事务的控制。

### (三) 19 世纪以来叙利亚阿拉维派的文化启蒙运动

19 世纪中期后, 美国福音派新教传教运动进入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叙利亚地区,<sup>④</sup> 福音派传教运动的主要动机是将福音派宗教思想和实践传播至

① Aslam Farouk-Alli, “Sectarianism in Alawi Syria: Exploring the Paradoxes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Vol. 34, No. 3, 2014, p. 210.

② 关于伊本·泰米叶针对阿拉维派的法特瓦详见王霏《法特瓦与阿拉维派被承认的历史》, 《世界宗教研究》, 2012 年第 6 期, 第 109 ~ 110 页。

③ Leon Goldsmith, “‘God Wanted Diversity’: Alawite Pluralist Ideals and their Integration into Syrian Society 1832 – 1973,”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0, No. 4, 2013, p. 396.

④ Yvette Talhamy,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Activity among the Nusayris (Alawis) in Syr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7, No. 2, 2011, p. 222.

古代基督教起源地区。福音派传教活动进入叙利亚地区后，早期传教对象是东仪天主教等本土基督教派，而后将传教对象扩大到叙利亚地区的阿拉维派、伊斯玛仪派等。福音派传教运动为了将宗教思想扎根于当地平民阶层，采用了教育传教方式。所谓教育传教是指在阿拉维派等群体聚居区的城市或乡村建立中小学校，吸收当地儿童和青少年入学接受福音派学校的西式教育。19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境内尚未建立初级公立教育体系，福音派通过教育传教取得了当地阿拉维派家庭的信任并被接纳。福音派中小学校以宗教教育和世俗科学教育并重，试图将福音派宗教思想灌输给当地青少年和儿童。

阿拉维派聚居的拉塔基亚地区是当时福音派传教活动中心之一，因而阿拉维派群体对福音派教育传教活动持较为温和的接纳态度。数百年来阿拉维派被马穆鲁克、奥斯曼帝国等政权歧视和压迫，阿拉维派支持福音派传教活动的主要原因是后者提供的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投入，事实上传教活动并未使阿拉维派信仰产生动摇，只有极少数阿拉维派以个人名义皈依新教和接受洗礼。另外，奥斯曼帝国统治者日益意识到欧美教育传教活动对其统治的威胁，在阿拉维派聚居区广泛地建立学校和清真寺，通过各种法令和手段限制或关闭西式学校。

福音派传教活动虽然未能实现其目标，但对阿拉维派产生了影响。西式教育的传播使阿拉维派产生了融入伊斯兰世界主流的意识。教育普及使阿拉维派的政治意识增强，社会参与能力得到提升。阿拉维派意识到加强与外部世界交流和学习的重要性。阿拉维派宗教学者发起更名运动，宣称阿拉维派属于伊斯兰教什叶派信仰。20世纪20年代，阿拉维派知识分子和宗教学者通过更名运动将“努赛里”改称为“阿拉维”。阿拉维派知识分子更新教派名称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其一，“努赛里”凸显阿拉维派的独立特征，不利于与叙利亚其他族群、教派的交往。其二，更名为“阿拉维”可以拉近与伊斯兰教主流派别特别是十二伊玛目派的联系，<sup>①</sup>有助于彰显阿拉维派的合法性。直至当代，中东地区部分歧视阿拉维派的逊尼派依然称阿拉维派为“努赛里派”，试图强调他们与伊斯兰教主流派别的差异性，突

---

<sup>①</sup> al-Tamimi Aymenn Jawad, “Anti-Islamism in an Islamic Civil War,” January 24, 2013, *The American Spectator*, <http://spectator.org/archives/2013/01/24/anti-islamism-in-an-islamic-ci>.

出其“异端”特征。

## 二 从社会边缘到政治中心的阿拉维派

1918 年“一战”结束标志着奥斯曼帝国对叙利亚四百多年统治的终结,阿拉维派也由此摆脱了社会边缘地位和被歧视的“异端”身份,阿拉维派对法国在黎凡特地区的委任统治持支持态度,法国委任统治政府对阿拉维派采取社会平等化政策并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自治地位,阿拉维派也成为法国制衡叙利亚逊尼派城市贵族的牵制力量之一。

1920 年法国军队进入叙利亚,迅速接管包括阿拉维派聚居区在内的叙利亚全境,根据英法操控的国联(League of Nations)决议,法国对叙利亚实施所谓的委任统治。法国在叙利亚的委任统治基本策略是分而治之政策,通过打压主体民族和扶持少数民族群加强法国人在叙利亚的统治地位。法国在阿拉维派聚居区建立“阿拉维自治区”(The Autonomous District of the Alawis),将阿拉维派聚居区从大马士革控制下分离;1922 年法国以宗教少数派和少数民族为基础将叙利亚分割为“德鲁兹国”(Druze State)、“阿拉维国”<sup>①</sup>(Alawi State)、“杰齐拉自治区”(Autonomous District in Jazira)、“亚历山大勒塔自治区”(Autonomous District in Alexandretta)等,1930 年法国政府将“阿拉维国”更名为“拉塔基亚政府”(Government of Ladhikiyya),自治政府一直延续至二战中法国维希政府统治叙利亚时期(1939~1942 年)。

“阿拉维国”建立后,形成了独立于大马士革的自治政府,阿拉维派在自治政府中占绝对多数。“阿拉维国”的地域范围包括了地中海东岸至贾巴勒·努赛里亚山脉之间的平原和山地区域,首府为拉塔基亚,“阿拉维国”下辖的主要城镇包含了塔尔图斯(Tartous)、巴尼亚斯(Banyas)等。“阿拉维国”的最高行政机构是由 17 名选举代表组成的“代表委员会”(Representative Council)。代表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严格按照教派比例结构产生,

---

<sup>①</sup> 法国按照民族、教派分布特征建立的“阿拉维国”等行政区域单元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现代民族组成的主权国家,而是在大叙利亚地区框架下的次级自治行政单元,因此“阿拉维国”实质上是在阿拉维派聚居区建立的、拥有相对行政独立性的自治实体。1936 年后法国将叙利亚境内的自治实体逐步统一为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并以大马士革为政治中心。

阿拉维派、逊尼派、基督徒、伊斯玛仪派的代表人员比例为 10:3:3:1。<sup>①</sup> 代表委员会主席由阿拉维派部落联盟产生。

1922 年“阿拉维国”的建立标志着阿拉维派第一次获得内部自治权利，这是阿拉维派命运的转折点。政治上阿拉维派取得自治地位；司法方面可以任命阿拉维派法官审理案件，摆脱了逊尼派对阿拉维派的司法管辖权；经济方面可自主制定税率，享受法国当局的财政补贴。

阿拉维派与法国在委任统治初期形成了默契的合作关系。法国在政治上保证阿拉维派的自治地位，阿拉维派通过参军充当法国人的军事工具。阿拉维派充实了法国黎凡特地区部队，黎凡特特别部队（*Troupes Speciales du Levant*）8 个步兵营中阿拉维派士兵占了 50%。<sup>②</sup>

1936 年法国将上述“自治区”或“独立国”合并为叙利亚国家<sup>③</sup>，面对阿拉维自治政府将被融合于逊尼派阿拉伯人掌控的叙利亚国家，阿拉维派内部存在不同的政治倾向，一派主张与叙利亚分离和黎巴嫩合并，一派主张统一于叙利亚国家，还有部分人主张维持自治地位。<sup>④</sup> 从 3 月起不断有阿拉维派向法国当局递交请愿书反对阿拉维派聚居地区并入叙利亚国家，要求法国继续对拉塔基亚地区实施保护。数天后，阿拉维派贵族包括哈菲兹·阿萨德的祖父苏莱曼·阿萨德在内 6 人向法国总理莱昂·勃鲁姆致信，反对将“拉塔基亚自治区”并入叙利亚国家。9 月，由 40000 人签署的请愿书再次递交给法国政府。虽然主张分离的阿拉维派反对与大马士革合并为统一的叙利亚，但请愿运动未能阻碍叙利亚国家一体化进程的历史趋势。

法国委任统治叙利亚时期阿拉维派融入叙利亚社会的进程不断推进，而教派间的沟壑和矛盾并未弥合。法国委任统治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军事等领域均给了阿拉维派相当程度的优待，阿拉维派日益摆脱了边缘化的社会地位；而在叙利亚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之下，阿

① Leon Goldsmith, “‘God Wanted Diversity’: Alawite Pluralist Ideals and their Integration into Syrian Society 1832 – 1973,”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0, No. 4, 2013, p. 399.

② Danial Pipes, “The Alawi Capture of Power in Syria,”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25, No. 4, 1989, p. 438.

③ 其中亚历山大勒塔被割让给土耳其，部分阿拉维派穆斯林成为土耳其公民。

④ Gitta Yaffe-Schatzmann, “Alawi Separatists and Unionists: The Events of 25 February 1936,”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1, No. 1, 1995, p. 30.



拉维派与逊尼派建立了社会融合的共同基础和政治联盟,阿拉维派的分离主义倾向逐渐消弭,阿拉维派积极地参与了建立现代叙利亚国家和反抗委任统治制度的斗争。但是,阿拉维派在政治、宗教等领域依然是被边缘化的群体,逊尼派对阿拉维派的宗教偏见和社会歧视根深蒂固,<sup>①</sup>教派之间的隔阂为叙利亚国家政治稳定与发展埋下了隐患。

1946 年叙利亚共和国建立标志着叙利亚历史进入独立时代,逊尼派政治精英成为国家政治的主宰,阿拉维派自治理想破灭。19 世纪至 20 世纪 20 年代的叙利亚政治被称为贵族政治时代,20 年代后民众政治登上叙利亚政治舞台,新的社会和政治势力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城市贵族精英阶层。叙利亚建国初期曾建构起一套类似于西方式的议会民主体制,实际是以部落、家族为基础的寡头政治 (Oligarchy Politics),议会中代表新兴社会阶层和普通民众利益的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 (The Syrian Muslim Brotherhood, SMB) 和复兴党 (The Ba'th Party) 开始崭露头角,传统政治精英在叙利亚趋于衰落。1952 年镇压阿拉维派起义后<sup>②</sup>,叙利亚政府废除了阿拉维派自治权利,包括阿拉维派军事组织、议会席位和属人法庭等特殊权利。

20 世纪 50 年代大马士革政府对阿拉维派实施了较为严格的限制,而阿拉维派通过叙利亚国防军和复兴党等国家机器或政党工具逐渐上升至叙利亚国家政治权力中心。阿拉维派在叙利亚国防军和复兴党中发展主要得益于叙利亚 50 年代特殊的国内政治环境,议会民主制度的脆弱性和军人干政导致叙利亚政治发展陷入军政府和民选政府之间的摇摆和混乱,逊尼派政治集团的相互斗争给予了阿拉维派政治空间。

参加叙利亚国防军是阿拉维派聚集政治影响力的主要方式之一。阿拉维派对叙利亚国防军的影响并非有目的和有意识的政治觉醒,阿拉维派群体参军的主要动机是维持一定水平的经济收入,<sup>③</sup>参军是阿拉维派男性青年寻找工作和增加家庭收入的主要途径之一。当阿拉维派在叙利亚社会经济地

① Heather M. Robinson, Ben Connable, David E. Thaler, Ali G. Scotten, *Sectarianism in the Middle East: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p. 77.

② 反对与叙利亚合并的阿拉维派自 1939 年后多次发起军事抗争运动,其领导人是阿拉维派领导人苏莱曼·穆尔希德 (Sulayman al-Murshid)。穆尔希德发动过两次起义,失败后被政府处死。其子 1952 年发动了第三次起义,但以失败告终。

③ Hanna Batatu,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Social Roots of Syria's Ruling, Military Group and the Causes for Its Dominanc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35, No. 3, 1981, p. 341.

位有效提高后，新一代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的阿拉维青年考入叙利亚军事院校，步入军人集团上升途径，进而改变了叙利亚军队中高级军官的教派比例。1946~1963年叙利亚的议会民主体制遭到军事政变破坏，军人干政不仅导致民主体制退化，也使逊尼派军官力量迅速衰退。传统上逊尼派阿拉伯人对军队中的高级职位较为重视，阿拉维派军官集中在中下级军官职位。1949年后不断爆发的军人政变特别是逊尼派内部斗争导致自身力量日渐衰退，阿拉维派军官保持内部团结，形成了许多军队系统内部的秘密组织。20世纪50年代后位居高级职位的逊尼派军官在相互夺权的军事政变中被清洗或降职，阿拉维派军官得到晋升机遇，逐渐垄断了军队高级职位，通过内部团结维持地位稳定。<sup>①</sup>这一时期叙利亚国防军中阿拉维派身份的军人数量不断攀升，1945~1949年国防军中阿拉维派军人数量从10000人增加至12000人。<sup>②</sup>

复兴党是阿拉维派参与叙利亚国家政治的政党工具。叙利亚复兴党秉持世俗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内容，一直密切联系和动员有农村和少数民族背景的普通民众入党。复兴党的社会主义思想纲领有助于少数民族摆脱被歧视的社会经济地位，标榜社会公平、反剥削的内容得到贫穷的阿拉维派的支持；世俗主义政治理想不以宗教教派为界限划分社会成员身份，对千百年来一直遭受逊尼派宗教歧视和社会边缘化的阿拉维派具有吸引力，而世俗主义也有助于提高阿拉维派的社会政治地位。20世纪50年代复兴党在阿拉维派聚居的拉塔基亚地区发展迅速，党员数量的快速增加使拉塔基亚分部成为复兴党第一大支部。

这一时期阿拉维派还得到了阿拉伯世界在宗教领域的普遍认可。1952年叙利亚国家宗教权威大穆夫提发布法特瓦承认阿拉维派是十二伊玛目派的分支，<sup>③</sup>埃及爱兹哈尔大学也发布法特瓦承认了阿拉维派的合法地位，这一时期宗教领域对阿拉维派的承认有助于推动阿拉维派融入叙利亚社会的进程。

20世纪60年代叙利亚政治延续了50年代的不稳定性，复兴党执政后

① Oded Haklai, "A Minority Rule Over a Hostile Majority: The Case of Syria,"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 6, No. 3, 2000, p. 33

② Amos Perlmutter, "From Obscurity to Rule: The Syrian Army and the Ba'ath Party,"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22, No. 4, 1969, p. 830.

③ Yvette Talhamy, "The Fatwas and the Nusayri,"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6, No. 2, 2010, p. 187.

陷入了内部权力斗争，阿拉维派高级军人集团在权力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确立了叙利亚威权主义政治体制，该体制不仅终止了纷乱不止的政治动荡，也确立了阿拉维派从社会边缘迈入政治中心的权力地位。

阿拉维派和其他少数族群或教派尝试改变叙利亚社会教派权力结构始于秘密组织“军事委员会”（Military Committee）的建立。军事委员会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sup>①</sup>时期叙利亚复兴党的青年军官群体建立的，成员包括哈菲兹·阿萨德等阿拉维派军官和伊斯玛仪派等派别的军官。<sup>②</sup>军事委员会的政治目标是打破逊尼派阿拉伯人对叙利亚国家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垄断，以便于其他少数族群和教派群体全面地参与和融入叙利亚社会。<sup>③</sup>

1963~1970年复兴党内部为争夺国家最高权力展开了激烈斗争，这一时期叙利亚政治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1963~1966年）是复兴党内部阿拉维派、伊斯玛仪派和逊尼派军官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1963年3月8日，复兴党发动“三月革命”建立新政府，政府内部阿拉维派和逊尼派展开激烈斗争。“三月革命”后军事委员会实际掌握着叙利亚军权。军事委员会由3名阿拉维派军官和2名伊斯玛仪派军官组成。新政府建立后逊尼派复兴党党员阿明·哈菲兹（Amin Hafiz）担任叙利亚总统，阿明·哈菲兹拉拢逊尼派党员和军官捍卫自己的政治地位。1966年2月23日，复兴党阿拉维派发动“二月革命”取代了阿明·哈菲兹政府。阿拉维派掌权后，加强了对军队和复兴党的领导权和控制，阿拉维派官员被委任以军队关键职位；阿拉维派掌权后大量从拉塔基亚、豪兰和代尔祖尔等少数族群聚居区招募叙利亚复兴党地区指挥部党员。<sup>④</sup>

第二阶段（1966~1970年）是复兴党内部阿萨德派与贾迪德派的国家

①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是1958~1961年叙利亚和埃及两国合并后的国家名称，简称为“阿联”，这一时期埃及方面掌握了叙利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权力，引起包括复兴党在内的叙利亚国内极强的反弹情绪和不满，1961年叙利亚政变后终止了“阿联”的政治存在。

② Martin Seymour, “The Dynamics of Power in Syria Since the Break with Egypt,”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6, No. 1, 1970, p. 39.

③ Malcolm Kerr, “Hafiz Al-Asad and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Syrian Polit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28, No. 3, 1973, p. 693.

④ Danial Pipes, “The Alawi Capture of Power in Syria,” *The Alawi Capture of Power in Syria*,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25, No. 4, 1989, p. 444.

发展路线之争。1966年后阿拉维派军官集团的萨拉赫·贾迪德和哈菲兹·阿萨德就国家发展路线展开了激烈斗争。贾迪德和阿萨德对叙利亚国家发展的政治路线有不同观念，贾迪德坚持意识形态至上，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事业，对内主张激进改革；阿萨德是现实主义务实派，他主张以国家利益作为确立叙利亚外交政策的基础，对内推行渐进性改革措施推进土地改革和国有化。1970年约旦“黑九月事件”成为贾迪德派和阿萨德派政治矛盾爆发的导火索，贾迪德主张帮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抗约旦政府，阿萨德拒绝派出空军援助地面部队，阿萨德发动纠正运动解除了贾迪德的所有职务，<sup>①</sup>阿萨德执政后逐步调整复兴党之前激进的对外政策和国内改革措施，并确立了以阿萨德为中心的新威权主义政治体制。

阿拉维派军人集团的政治中心化标志着阿拉维派社会边缘地位的终结，但军人集团对叙利亚政治、军事的领导和控制权力并不意味着阿拉维派作为少数派统治了叙利亚的其他教派群体。虽然复兴党、政府系统、国防军中阿拉维派身份的官员或军人占据了较高比例，实际上逊尼派、基督徒、伊斯玛仪派、德鲁兹派在政治和军事领域中也占一定的比例。因此，阿拉维派军人集团的政治中心化只能证明阿拉维派发挥了超越其人口比例的政治影响力，而不能由此高估或断定复兴党、政府、国防军的所谓“阿拉维化”论断。另外，根据材料事实也可以确定阿拉维派身份在阿萨德政治体制中发挥着特殊性作用，阿拉维派政治精英、军人集团、商人集团对阿萨德体制具有特殊影响力。这一现象在中东地区威权主义体制中具有普遍性，如萨利赫、卡扎菲、萨达姆、穆巴拉克等威权主义政府无一例外依靠总统身后的家族集团、部落集团、教派或民族集团。威权主义体制一方面需要依靠传统身份认同的血缘、地缘联系稳固统治基础，另一方面要运用现代政治工具推行其政治运行功能，而家族亲缘、部落民族地缘等因素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三 当代叙利亚阿拉维派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1970年开始执政的哈菲兹·阿萨德统治叙利亚30年。阿萨德秉持现实

---

<sup>①</sup> 王新刚：《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商务印书馆，2003，第243~249页。

主义政治原则。在内政方面,阿萨德以阿拉维派精英群体构筑其统治基础,以阿萨德家族和亲缘部落联系为核心建构统治中心。阿萨德牢牢掌控着国家军队力量,将武装力量划分为总统卫队和国防军,军队指挥权主要由阿萨德家族成员或阿拉维派军官掌握,总统卫队长官由阿萨德核心家族成员担任。在外交方面,早期阿萨德以世俗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为旗帜维护叙利亚国家利益,成为抗击以色列的前线国家;20 世纪 90 年代初冷战结束后阿萨德加强与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政治联系,在巩固叙伊同盟的基础上与真主党建立准同盟关系。

### (一) 哈菲兹·阿萨德执政时期的教派合作政策

哈菲兹·阿萨德执政后对叙利亚国内的教派关系奉行教派合作政策,试图拉拢逊尼派中产阶级和精英阶层与之合作,抛出教派合作的政治姿态。

首先,哈菲兹·阿萨德在意识形态方面奉行民族主义、世俗主义思想,对外积极参与巴以问题,以此弱化叙利亚国内的教派矛盾,强调叙利亚国家的阿拉伯民族性和社会的世俗性。哈菲兹·阿萨德以叙利亚的泛阿拉伯认同调动国内的民族主义力量,对外的政治话语和外交政策以支持巴勒斯坦民族独立事业和抵抗以色列为重点。对内方面,哈菲兹·阿萨德坚持世俗主义的国家建设方向和政教关系,对于政治伊斯兰导向的穆斯林兄弟会社会运动予以否定和打击,双方的暴力冲突引发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叙利亚国内的政治动荡,叙利亚政府一度滑向内战边缘。

其次,哈菲兹·阿萨德通过权力分享和利益置换扩大统治基础,与逊尼派中产阶级和精英阶层相互合作,由此维持了国内政治稳定和跨教派合作。哈菲兹·阿萨德将国家政治体系中的部分关键职位分配给逊尼派政治盟友,以权力分享拉拢逊尼派政治精英阶层。例如,逊尼派出身的穆斯塔法·塔拉斯(Mustafa Talas)曾长期担任叙利亚国防部部长,<sup>①</sup>他是叙利亚军方的核心人物和跨教派合作的重要表征。经济方面,哈菲兹·阿萨德重用逊尼派和基督徒商人群体,给予他们丰厚的经济回报,国家公共部门的工人阶级和城市中层也是享受经济利益回报而支持阿萨德体制的阶级

---

<sup>①</sup> Heather M. Robinson, Ben Connable, David E. Thaler, Ali G. Scotten, *Sectarianism in the Middle East: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p. 78.

基础。宗教生活方面，哈菲兹·阿萨德表现出超脱于教派的立场，他曾以麦加朝觐的方式试图争取逊尼派支持。

哈菲兹·阿萨德成为叙利亚总统后，致力于将阿拉维派融入叙利亚社会，打破逊尼派对阿拉维派的偏见。阿萨德请黎巴嫩什叶派宗教学者穆萨·萨德尔发布法特瓦承认阿拉维派为十二伊玛目派。<sup>①</sup>虽然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巴勒斯坦、伊朗、埃及、黎巴嫩等国权威的乌莱玛曾多次发布法特瓦承认阿拉维派的宗教合法地位，实际上法特瓦未能缓和叙利亚国内逊尼派政治伊斯兰运动对阿萨德政府的挑战。

20世纪70年代，叙利亚阿拉维派与正统逊尼派之间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矛盾。其一，逊尼派阿拉伯人与阿拉维派存在教派间交往障碍，两个教派间很少通婚，逊尼派对阿拉维派的社会偏见普遍存在。其二，部分极端逊尼派不承认阿拉维派信仰的合法性，依然将其视为“异端”。<sup>②</sup>其三，阿拉维派主张叙利亚社会的世俗主义特征和政教分离关系，与坚持伊斯兰主义的逊尼派存在尖锐矛盾。其四，复兴党推行的土地改革、企业国有化等改革措施严重损害了城市逊尼派的社会经济利益，促使70年代反阿拉维派情绪日益增长。<sup>③</sup>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叙利亚逐步滑向内战边缘，以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势力试图挑战复兴党政府的威权统治，双方的矛盾不可避免地激化为一场大规模社会冲突。导致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从温和政治反对派演变为激进军事武装派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素之一是穆斯林兄弟会将复兴党政府与阿拉维派联系为政治同盟，认为复兴党政府是阿拉维派利益的政治工具，<sup>④</sup>因此，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与复兴党政府当时的矛盾冲突具有一定的教派冲突色彩。

① Christopher Phillips, "Sectarianism and Conflict in Syri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6, No. 2, 2015, p. 366.

② Eyal Zisser, "The Alawis, Lords of Syria: From Ethnic Minority to Ruling Sect," in Ofra Bengio and Gabriel Ben-Dor eds., *Minorities and the State in the Arab World*, p. 92. "The Alawis, Lords of Syria: From Ethnic Minority to Ruling Sect," p. 98.

③ Brynjar Lia, "The Islamist Uprising in Syria, 1976 - 1982: The History and Legacy of a Failed Revolt,"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4, No. 4, 2016, p. 544.

④ Raymond A. Hinnebusch, "The Islamic Movement in Syria: Sectarian Conflict and Urban Rebellion in an Authoritarian-Populist Regime," in Ali Hilal Dessouki eds., *Islamic Resurgence in the Arab World*, New York: Praeger, 1982, p. 138.

1976 ~ 1982 年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与阿萨德政府之间发生了多次暴力冲突,以 1982 年哈马事件为标志结束了长达六年的国内冲突,阿萨德政府的坚决应对举措避免了叙利亚陷入内战。1982 年哈马事件使穆斯林兄弟会组织基础遭受沉重打击,残存的领导阶层流亡海外。虽然阿萨德政府以军事弹压的强硬举措暂时消弭了穆斯林兄弟会运动对叙利亚政治体制的挑战,但叙利亚社会存在的世俗与宗教、教派关系、威权与民主、政治稳定与经济增长等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而巴沙尔·阿萨德执政后的政治多元化与经济自由化改革也没有化解叙利亚社会内部存在的危机隐患。

## (二) 叙利亚危机对阿拉维派的挑战

2000 年哈菲兹·阿萨德去世后其子巴沙尔·阿萨德出任叙利亚总统。进入 21 世纪后的叙利亚面临改革与发展的新局面,年轻的巴沙尔决心对叙利亚国家进行改革。巴沙尔执政后在政治上推行有限民主化,强调复兴党领导的、通过全国进步阵线完成的政治多元化,<sup>①</sup>即所谓“大马士革之春”,但政治改革由于反对派进一步要求扩大政治民主化程度而终止。

2005 年叙利亚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复兴党严密控制的有限市场经济体制面临危机,巴沙尔在第十个五年计划中实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这一举措对叙利亚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市场化改革导致政府放弃了对农村地区的农业补贴,而叙利亚农村绝大多数农民为逊尼派阿拉伯农民,贫困化和生活困境使他们对政府和阿拉维派不满,指责政府给予阿拉维派所在地区补贴而忽略了其他地区。此外,在市场化改革中一些与阿萨德家族有联系的阿拉维派商人赚取巨额利润,他们的暴富也引起逊尼派不满。内战爆发后霍姆斯逊尼派曾对本地阿拉维派家庭进行了大规模经济掠夺和报复。

2011 年 3 月,叙利亚国内爆发大规模民众示威游行,抗议活动从德拉蔓延到中部的哈马、霍姆斯等地区,反对派活动升级为军事反叛活动后与巴沙尔政府军发生激烈的军事冲突,导致叙利亚危机全面爆发。叙利亚危机一方面源于叙利亚国家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另一方面也是中东变局的推动以及域外大国和地区大国博弈的结果。其中族群 - 教派冲突 (Ethno-sectarian Conflict) 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有学者称之为半教派冲突 (Semi-

---

<sup>①</sup> 王新刚等:《现代叙利亚国家与政治》,人民出版社,2016,第 393 页。

Sectarian Conflict)。<sup>①</sup> 叙利亚危机爆发后教派冲突随之产生，阿拉维派、基督徒等宗教少数派遭到极端反对派的残酷袭击。霍姆斯、伊德利卜、大马士革、萨达德等城市爆发逊尼派对阿拉维派和基督徒的暴力行为，许多阿拉维派平民被迫逃离故土，教派冲突在叙利亚各地频频发生。

阿拉维派普通民众事实上是叙利亚内战的受害者，叙利亚危机爆发后阿拉维派伤亡人数直线上升，据不完全统计，2011~2013年就有10000人死于战火，<sup>②</sup> 霍姆斯、阿勒颇等战火频仍的地区伤亡比例和难民比例非常高。

叙利亚危机对阿拉维派造成的影响可以概括为安全、政治、教派主义等层面。

第一，叙利亚危机造成的群体安全威胁是内战对阿拉维派最重要的影响和现实威胁。叙利亚危机爆发后，政府军和反对派在阿勒颇、霍姆斯等大城市激烈交火；2014年后“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等极端主义组织造成了对阿拉维派群体的直接威胁和伤害，极端主义组织将阿拉维派视为巴沙尔政权的天然同盟，把阿拉维派信仰特征认定为“异端”，阿拉维派平民极易受到极端分子的攻击和伤害，2016年5月，叙利亚扎拉镇（al-Zara）19名阿拉维派平民被极端分子杀害，<sup>③</sup> 扎拉镇事件只是叙利亚危机期间阿拉维派平民面临生命安全威胁的案例之一。多方面数据来源显示，从叙利亚危机爆发至2017年初，叙利亚已有15万阿拉维派平民死亡。<sup>④</sup>

第二，阿拉维派因针对巴沙尔政权的不同政见而产生内部政治分裂。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叙利亚国内部分逊尼派组织把阿拉维派与复兴党政权相提并论，或认为复兴党政府是阿拉维派的政治工具，或认为复兴党政府和阿拉维派具有天然的政治同盟关系。事实上，复兴党的政治意识形态

---

① Christopher Phillips, "Sectarianism and Conflict in Syri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6, No. 2, 2015, p. 361.

② Jomana Qaddour, "Unlocking the Alawite Coundrum in Syri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6, No. 4, 2013, p. 67.

③ "Insurgents Seize Syrian Alawite Village, Killing 19," Reuters, May 13, 2016,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syria-village-idUSKCN0Y41ME>.

④ "150, 000 Alawites Killed in 6-year Syria War," *Middle East Monitor*, April 20, 2017,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170420-150000-alawites-killed-in-6-year-syria-war/>.



是世俗民族主义导向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或称之为复兴民族主义），其政治话语体系的核心诉求“统一、自由与社会主义”并无特定的宗教或教派倾向，而阿拉维派、伊斯玛仪派等叙利亚少数教派被吸收加入复兴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该党政治意识形态的世俗性，有助于动员少数教派或族群加入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因此，复兴党政府既不是阿拉维派的政治工具，也并非与特定教派联系为所谓的政治同盟，叙利亚危机中阿拉维派群体与其他教派对巴沙尔政府的政治态度存在截然不同的倾向。<sup>①</sup>

叙利亚危机爆发后，阿拉维派群体出现三种不同的政治倾向：支持巴沙尔政府、反对巴沙尔政府和中立主义。支持巴沙尔政府是阿拉维派群体的主流政治倾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巴沙尔政府与阿拉维派之间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阿拉维派中的体制阶层和公共部门阶层以及民兵武装等不同社会集团需要维持现政权以捍卫其自身利益。其二，叙利亚危机爆发后极端反对派已经将阿拉维派视为巴沙尔政府的政治工具和暴力实施对象，阿拉维派群体主体部分已无法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保持中立，教派主义话语和暴力冲突将阿拉维派推向了巴沙尔政府一方。加入反对派投身于反抗巴沙尔政府的阿拉维派群体主要是普通城市或乡村边缘化青年，他们在自由化改革中未得到切身利益，或对复兴党威权主义体制存在政治不满情绪。叙利亚危机爆发后拉塔基亚地区曾爆发了阿拉维派青年的反政府示威活动。中立主义者既不支持现政权，也不倾向于加入反对派，其选择只能是流亡国外或远离军事冲突旋涡。教派内部团结曾经是阿拉维派与叙利亚社会融合而成为政治中心的关键性原因之一，叙利亚危机的全面冲击使阿拉维派内部政治团结不复存在。

第三，教派主义政治话语对叙利亚教派关系的影响威胁着阿拉维派与逊尼派的和谐关系。叙利亚危机爆发后，极端主义武装逐渐在反对派中占据优势地位，其中以“伊斯兰国”和努斯拉阵线（al-Nusra Front）为主要代表。极端主义武装势力的意识形态根植于对所谓“异端”的排斥和定判，阿拉维派因而成为这类极端主义势力构建其话语体系的直接对象。其一，极端主义势力的教派主义政治话语体系把阿拉维派定义为“伪信者”的

---

① Carsten Wieland, “Alawis in the Syrian Opposition,” in Michael Kerr and Craig Larkin eds., *The Alawis of Syria: War, Faith and Politics in the Levant*, pp. 225 – 245.

“异端信仰”范畴,<sup>①</sup>以定性方式否定了阿拉维派信仰的合法性。其二,极端主义势力将阿拉维派与巴沙尔政权交织为同一性的政治同盟,从逻辑上推演了其武装活动的合法性,也将阿拉维派政治化和对立化,要求阿拉维派为叙利亚政治背负责任。其三,极端主义势力通过现代网络新媒体广泛地传播其敌视和污名化阿拉维派的教派主义政治话语体系,试图激起叙利亚域内外地区对阿拉维派的敌意和仇恨心理。

近年来,俄罗斯和伊朗对叙利亚危机的军事介入政策极大地改变了叙利亚战场形势和政治、军事格局,“伊斯兰国”极端主义武装主力基本被消灭,其盘踞的叙利亚中东部领土相继被政府军和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收复,阿拉维派面临的教派主义仇视和极端主义势力的威胁得到了有效缓解,叙利亚政治、经济和安全重建已步入正轨。目前,叙利亚国内大部分区域已基本实现停火,政府军有效控制了除伊德利卜省和库尔德人聚居区之外绝大部分的城市和乡村地区,战争形势和政治格局变化正在促使叙利亚问题沿着政治和解的方向发展。

## 结 语

阿拉维派在叙利亚历史进程中曾经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少数教派,政治边缘化、宗教歧视和经济贫困一直困扰着这一信仰群体。19世纪以来阿拉维派开始走上与叙利亚社会融合、对外自觉交往的道路。阿拉维派从社会边缘走向政治中心的历史嬗变与现代叙利亚政治发展进程存在密切关系,法国委任统治制度给予了阿拉维派内部自治权利,实现了阿拉维派社会平等化的历史进步。1946年叙利亚共和国建立后的军人干政和议会民主制度的脆弱性产生了政治中心权力真空,阿拉维派军人集团以复兴党和国防军为政党政治工具,确立了复兴党政府执政地位。冷战结束后叙利亚经历了政治权力新旧交替过程,巴沙尔执政后推行了政治自由化、经济多元化改革,改革进程受阻后社会内部矛盾不断积聚,受中东变局、地区危机和大国博弈的共同影响,叙利亚自2011年后爆发了全面性社会危机,国家陷入

---

<sup>①</sup> Heather M. Robinson, Ben Connable, David E. Thaler, Ali G. Scotten, *Sectarianism in the Middle East: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p. 86.

内战状态, 面临经济崩溃局势。阿拉维派群体也遭受了全方位冲击, 阿拉维派平民伤亡惨重, 难民流离失所; 政治上, 阿拉维派内部分裂; 社会危机破坏了叙利亚教派和谐关系, 极端主义组织通过建构教派政治话语体系对阿拉维派进行污名化和敌对宣传。

在叙利亚国家重建时期, 阿拉维派仍面临几个长期性问题。第一, 阿拉维派难民问题。阿拉维派难民包含了国内难民和国际难民两部分。阿拉维派难民回归或安置工作需要合理的治理政策和资金投入。在叙利亚难民治理方面并无教派或民族差异, 治理工作的主要难点是政策落实和资金投入。首先, 大量叙利亚难民流落至周边国家甚至是欧洲北非等域外地区, 由于长期流落在外或已安定生活, 加之部分难民对叙利亚国内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全的不信任感, 国际难民回归工作难度大, 且缺乏与其他国家的政策协调。相较而言, 国内流离失所的难民群体回归安置工作治理难度较小。其次, 叙利亚战后重建目前最大难点是资金困难。一方面叙利亚财政早已入不敷出, 重建工作推进困难; 另一方面, 叙利亚政府又深受欧美国家经济制裁, 同时与部分周边或域内国家关系不睦, 重建资金短缺。因此, 包括阿拉维派难民在内的全国性难民回归和后续治理问题, 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短缺困境。2020 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中东地区经济增长面临更大的压力, 这为叙利亚战后重建和难民治理问题增添了更多困难。

第二, 去教派化和族际关系重建问题。该问题的解决是叙利亚阿拉维派群体生存、安全发展的关键。首先, 需要承认叙利亚国内存在教派主义社会裂痕和教派主义话语体系。叙利亚政府应当积极推动去教派化的政治活动和社会工作, 核心目标是修复教派主义社会裂痕, 批驳境内外的教派主义媒体或社交话语, 通过官方多媒体渠道宣传和树立去教派化的话语体系。其次, 破坏叙利亚国内族际关系和谐的主要不稳定因素来自极端主义思想和组织的泛滥, 因而根除教派主义存在的土壤需要叙利亚政府持续推动境内的去极端化政策和实践, 继续打击境内残存的极端主义组织。建构社会安全体系和根除极端主义思想存在的土壤对于叙利亚战后的族际关系重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 阿拉维派内部团结问题。内部团结和参与战后重建涉及阿拉维派整体利益和社会平等地位等切身利益。目前, 影响阿拉维派内部团结的主要变量是对巴沙尔政府的政治态度, 而阿拉维派政治态度的主要影响因

素实际上是叙利亚战后重建的速度和效果。不完全统计显示，十年内战使叙利亚阿拉维派损失了近 10 万人口，还有数万人因战争不同程度致残或受伤。<sup>①</sup> 在哈菲兹·阿萨德时期和巴沙尔·阿萨德统治早期（2000 ~ 2010 年），阿拉维派成了叙利亚既有体制的既得利益阶层，阿拉维派青年积极拥护阿萨德家族和复兴党统治，但在内战爆发以来，阿拉维派对于大规模内战所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而巴沙尔政府日益依赖于伊朗和俄罗斯的政治现实，使阿拉维派青年对既有体制和政治现状更为失望，群体内部政治分化更为明显。因此，叙利亚重建进程的速度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阿拉维派对巴沙尔政府的政治态度；同时，巴沙尔政府也需要积极有为地与阿拉维派群体分享重建利益，重建更为平衡有效的国内政治秩序，消弭阿拉维派青年对政治现实的不满和消极情绪。

[责任编辑：白胜洁]

---

① Alimar Lazkani, "No Homeland, No Future: Alawite Youth As the Backbone of the Assad Regime," *Arab Reform Initiative*, August 4, 2020, <https://www.arab-reform.net/publication/no-homeland-no-future-alawite-youth-as-the-backbone-of-the-assad-regime/>.

# From the Brink to the Center: The Evolution of Syrian Alawites and the Realistic Challenge

*Yang Yulong*

**Abstract:** Syrian Alawites has a variety of characteristics of belief integration, tribalism, Taqiya and centralized settlement distribution. The Western-style education of the Evangelical Missionary movement in the 19th century awakened the awareness of the Alawites' integration into the mainstream Islamic world and opened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of Alawites with Syrian society. The French mandate system granted the Alawites internal autonomy right and realized the social equality of the Alawites, the fragility of the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and the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politics led to the chaos of Syri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which created a rising channel and power vacuum for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Alawites, The Alawites officers' class rose to the state Power centre through the National Defence Force and the Ba'th Part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sad system, the complex contradictions in society are transformed into the social movement of the Muslim Brotherhood, which forms a severe challenge to the Assad system. The 2011 Syrian crisis has had an all-out impact on the Alawites, causing a threat to group security, internal political divisions, and a rift in sectarian relations. In the past two years, the situation on the battlefield in Syria has been fundamentally reversed, the crisis has greatly eased the challenge to the Alawites group, and Alawites in the future period of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will face the urgent need to solve the issues of Alawites refugees, sectarian relations, reconstruction of internal unity.

**Keywords:** Alawites; Syria; Ba'th Party; Muslim Brotherhood; Syria Crisis